

遥远的过去

——我的哥哥契诃夫

【苏联】玛丽雅·巴甫洛夫娜·契诃娃 著

尼·亚·瑟索耶夫 整理

史永利 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Distant Past

遥远的过去

——我的哥哥契诃夫

【苏联】玛丽雅·巴甫洛夫娜·契诃娃 著
尼·亚·瑟索耶夫 整理
史永利 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ers & Translation Press

契诃夫的妹妹玛丽雅（代序）

契诃夫是中国人很熟悉的俄罗斯作家，而他的妹妹玛丽雅·巴甫洛芙娜·契诃娃却鲜为人知。

玛丽雅出生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的第三年，即1863年，逝世于1957年。玛丽雅曾在逝世前一年写的回忆录《遥远的过去》中说：“我的生命确实是漫长的。……谁活得时间长，谁就应该做更多的事。我不敢说，我已经做了许多事，然而在我93岁的时候，我可以说：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作家契诃夫，因此我完成了我想做的事。”

玛丽雅生在一个大家庭里，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契诃夫是她的三哥，比她大三岁半。玛丽雅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子。她与哥哥契诃夫从少年时代起关系就很密切，这种关系是在患难中形成的。当玛丽雅13岁的时候，大哥和二哥已经离开家，去莫斯科读书，父亲在俄国南部塔甘罗格市经营的小食品杂货店倒闭，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不久，父亲为躲债也逃到莫斯科。后来，全家搬到莫

遥远的过去——我的哥哥契诃夫

斯科，只有契诃夫留在故乡中学读书。玛丽雅小小年纪，就要代替身患疾病的母亲，承担所有家务，洗衣做饭，缝缝补补，还要抽时间织头巾卖钱贴补家用。后来契诃夫曾经说：“玛丽雅是我们家的主管，要是她不在家，连粥锅都开不了。”契诃夫1879年中学毕业，争取到了故乡塔甘罗格市提供的助学金（每月25卢布），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医学。他的这笔助学金对处于苦难之中的契诃夫一家来说，简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全家人的日子才渐渐好转。契诃夫看到玛丽雅为维持家庭生活、照顾父母辛勤劳动，对她格外爱护和尊重。也就是从1879年起，契诃夫不但在大学读书，而且利用夜晚的时间拼命写作，开始踏上了文学之路。他用得到的稿费维持家庭生活，改变家人生活状况，后来还为玛丽雅缴学费，让她到高等女子学院学习。随着契诃夫的作品不断发表，他在家里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渐渐取代了父亲在家中的地位，成为一家之主。这样，契诃夫和玛丽雅便承担起照顾父母和家里生活的重担，成为契诃夫一家的两根互相依存的支柱。

1884年契诃夫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在家里挂牌行医，同时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逐渐成为俄国文坛上耀眼的新星。玛丽雅为哥哥契诃夫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在生活上对他细心照顾，千方百计为他创造舒适、安静的写作条件，同时还在医务上帮他的忙，成为哥哥的“医务助手”。有时契诃夫不在家，她都能为病人开药解忧。

契诃夫决心献身于文学事业后，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决定搬离莫斯科，到农村居住。玛丽雅对哥哥的病心急如焚，竟在隆冬季节顶着严寒为哥哥寻找、查看庄园。契诃夫对妹妹无限信任，自己连到实地看也没看，就同意购买玛丽雅选定的庄园。1892年契诃夫全家搬到离莫斯科不很远的梅里霍沃村居住。

此后，契诃夫写下大量作品，同时还从事繁重的社会工作：参加全俄人口普查，救济饥民，预防霍乱，为农民看病，为农民子弟建造学校，到萨哈林岛（即库页岛，下同——编者注）考察，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契诃夫的这些社会工作都是无偿的，非但如此，他还要经常为这些工作顺利开展，自掏腰

包，提供资金。在契诃夫的影响下，玛丽雅除了忙自己的中学教员工作和繁琐的家务外，还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为梅里霍沃的农民子弟建造了一所小学。她所建造的小学至今尚存。

玛丽雅年轻时长得很漂亮，心地善良，活泼愉快，许多人都追求她，向她求婚。可是她每次都把自己的婚姻大事告诉哥哥契诃夫，征求他的意见。最后一次，求婚者是她认识了多年的朋友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斯玛金。她心里斗争非常激烈，好几天没有给斯玛金回答。最后，她还是把斯玛金求婚的事向哥哥和盘托出。关于这件事，玛丽雅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哥哥当然明白我要嫁给谁，可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明白，如果我到另外的人家去，到自己的新家去，他不会承认他将感到痛苦……他永远不会说出‘不’这个字……几天过去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的坦白依然没有回答……我想了许许多多。最后，凭着对哥哥的热爱，凭着对他的依恋之情，我对问题做出了决断。我不能让哥哥不愉快，不能让他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变得不协调，不能让他失去我一直千方百计为他创造的写作环境。我告诉斯玛金，我拒绝他的求婚。”就这样，玛丽雅为了哥哥契诃夫抛弃了自己的婚姻生活，一生未嫁。但是，契诃夫直到逝世也不知道玛丽雅不结婚的原因。当斯玛金已经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的时候，还对朋友说，他爱了玛丽雅一辈子，然而，他也不知道玛丽雅为什么拒绝他的求婚。忠贞不渝的爱情是人间宝贵的感情，而玛丽雅对哥哥的爱却超越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呀！

正因为玛丽雅具有这种独特的品格才博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俄国著名作家布宁生前曾经给玛丽雅写信说：“在这个世界上与我最亲近的人不超过十个，而您是其中之一。”

1901年5月，契诃夫41岁的时候，与莫斯科艺术剧院才华出众的女演员克尼碧尔结婚。同年8月，契诃夫便写好了遗嘱，交给妻子保存。三年后，契诃夫逝世，玛丽雅才看到这份遗嘱。契诃夫在遗嘱中指定玛丽雅做他遗嘱的执行人。这说明，契诃夫非常信任妹妹玛丽雅，相信她一定能够完成自己的最后一

遥远的过去——我的哥哥契诃夫

次嘱托。

在契诃夫逝世后的年代里，玛丽雅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哥哥的嘱托，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契诃夫的文学事业。她把契诃夫遗赠给她的雅尔塔白色别墅精心地保护起来，并且把它变成契诃夫纪念馆，馆内一切物件都按契诃夫生前的样子保存着。玛丽雅说，这样能让她觉得，契诃夫好像还活着，只是到外地旅行去了。她热情接待来访者，向他们详细讲述契诃夫生前的故事。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玛丽雅克服重重困难，收集、整理、出版契诃夫的遗作和书信。光是契诃夫的书信就有整整六集，其中包括契诃夫写给玛丽雅的信434封。契诃夫逝世前三天写的最后一封信，也是写给妹妹玛丽雅的。契诃夫的书信内容极为丰富，是契诃夫文学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展示契诃夫的全貌，为研究契诃夫及其作品、生活、思想、道德、文学理论等等，提供了难得的宝贵材料。

十月革命胜利后，玛丽雅被任命为雅尔塔契诃夫纪念馆终身馆长。1953年8月4日，苏联联邦政府授予玛丽雅“功勋艺术工作者”荣誉称号，以表彰她“在收集、保存、研究俄国伟大作家安·巴·契诃夫文学遗产事业中做出的成绩”。

契诃夫生前曾经开玩笑地说过，他的作品人们最多读七年，然后就会被遗忘。可是，契诃夫1904年逝世，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在读契诃夫的作品，不仅俄国人在读，中国人和世界许多国家的人都在读。人们在阅读契诃夫作品的时候，想没有想到，那些作品里面也浸透着玛丽雅的心血？看没有看到，在契诃夫作品的背后，闪动着玛丽雅那美丽、善良、真诚、勤劳、热情、乐观、忘我、令人肃然起敬的身影？

史永利

2010年11月

目 录

契诃夫的妹妹玛丽雅（代序）	
一 童年	1
二 贫困的岁月	8
三 新的生活	13
四 沃斯克列辛斯克和巴勃基诺	21
五 库德林花园街	38
六 在卢卡	59
七 萨哈林岛之行	82
八 鲍基莫沃的夏天	94
九 寻找庄园	103
十 梅里霍沃	108
十一 我的朋友丽卡	138
十二 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干亲家	152

十三	“我的新朋友”	161
十四	《海鸥》在彼得堡	164
十五	第十六病室	170
十六	哥哥不在家的那个冬天	178
十七	父亲晚年的生活	184
十八	又是《海鸥》	192
十九	迁居雅尔塔	196
二十	莫斯科艺术剧院	211
二十一	哥哥的婚事	229
二十二	雅尔塔的生活	235
二十三	哥哥的逝世与安葬	263
二十四	半个世纪之后	269
	人名索引	277
	特别感谢	294
	附录：为什么契诃夫41岁才结婚？	295

一 童年

我1863年生在塔甘罗格市。

大约从六岁起我开始记事。那时，我们住在修道院街和集市街拐角上一所两层楼房里，那房子是莫伊谢耶夫家的。父亲在楼下开一个不大的食品杂货商店，我们一大家人，父亲、母亲、六个孩子，大部分人住在楼上，有几个人住在楼下。

我有五个兄弟。亚历山大比我大八岁，尼古拉大六岁，安东大三岁半，伊万大一岁，弟弟米哈伊尔比我小两岁。我们的父亲做的是小买卖，养活这样一家人是不容易的。我们这些孩子得干许多活儿。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要比别人干更多的家务，帮助母亲。哥哥们一般是在铺子里帮父亲做事，安托沙^①也如此。

按照当时老派家庭严格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父亲对孩子们要求苛刻而严厉。哥哥们做错了事，往往难免遭到皮鞭的惩罚。有时安托沙也挨父亲打。安东·巴甫洛维奇长大成人后，虽然性格非常温柔体贴，却也批评过父亲教育孩子的方法。父亲极力要孩子们接受宗教教育，他们必须到教堂

①安东的爱称。——译者注

遥远的过去——我的哥哥契诃夫

去祈祷，参加唱诗班唱诗，在家里没完没了地练唱。此外，作为父亲的帮手，哥哥们还要看守他的店铺，那是个枯燥无味的差事，正因为这些，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曾说，“在我的童年没有童年”。当然，人们不要忘记我们童年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的祖父，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原是一个地主家的农奴，受过农奴生活的严酷训练，我们的父亲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年轻时也是个农奴，后来才得以赎身。因此，我们家那种严格与冷酷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父亲童年时经历过的那种严酷和不自由生活的反映。然而我后来却感到奇怪，父亲那种演员式的性格，他对音乐、歌唱的热爱，他那些明晰的道德原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虽然他本人没有进过任何学校，但是他却想方设法送孩子们进中学读书。人们只要回想一下当时商人家庭的生活，以及他们对子女教育方面的反动观点，就能明白我们的父亲比他同阶层的人要高明多少。

所以，认为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对待子女纯粹是一个“残忍的暴君”是不对的。他是一个严厉的人，然而他杰出、有才能。

那些论述巴维尔·叶戈罗维奇专横性格的文学研究家，通常援引我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书信和回忆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大哥虽然很有才华和能力，不过他有病，醉酒病，发病时，想入非非地编造了许多东西。

安东·巴甫洛维奇喜欢大哥，可是他看到，疾病给大哥带来严重的后果。1888年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拿大哥有什么办法呢？没别的，光是叫人难受。他不饮酒的时候聪明、虚心、诚实、温和，可是一喝醉酒，就简直叫人受不了。他两三杯酒下肚，就会十分兴奋，开始胡扯。他写信就是要满足他那种要说、要写或者要编造某个无害而动人的假话的强烈愿望。他还没到产生幻觉的地步，因为他喝酒还算少。我根据他的信就能知道，他写信的时候是清醒的，还是喝醉了酒：有的信写得非常规矩、真挚，有的信却从头到尾都是胡说。他患有醉酒病，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在1905至1912年间发表的回忆录的某些章节会引起读者误解了。

此外，从父亲写给儿子们的信中也可以看出，大哥亚历山大年轻时代的生活有时多么让他生气，父亲对大儿子的性格、秉性又有多么细致入微的了解，他又怎样谨慎而委婉地努力教育他。在我的珍藏室里，保存着父亲写的一些信的原件。例如，1875年4月8日父亲给亚历山大写过一封信，当时亚历山大住在男子古典中学校长家里，做他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下面是这封信的摘录：

萨沙^①，我看你并不需要我们，我们放纵了你，你岁数这么小，就能自己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就是说，我们的话你是不会听的。……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随你的便，你没有我们也能行，也能活。只可惜，你这么早就忘了父母，可是我们把全部心血都花在你身上，为了把你养育成人，我们不惜花钱，不顾劳累……今后我只求你一件事：你要改改自己的脾气，对我们和对你自己都要厚道些；你又漂亮又聪明，可是你有些忘乎所以，你身上有一种自高自大的派头。萨沙，你可给我们添了很大的罪孽呀……

我们的母亲叶甫盖尼雅·亚科夫列芙娜跟父亲不一样，她是一个很温柔、安静的女人。她的性格平和可爱。我记得，我们总是津津有味地听她讲故事，那些不平常的、神话般的故事都充满诗情。与父亲严厉的外貌形成鲜明对比，母亲对孩子们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我们深有体会，而且铭记在心。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准确地说道：“我们的才能来自父亲，而我们的心灵来自母亲。”

安东·巴甫洛维奇早在17岁的时候，就给堂弟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契诃夫写信说：

父亲和母亲对我来说是举世无双的人，为了他们，我永远也不会吝惜

①亚历山大的爱称。——译者注

遥远的过去——我的哥哥契诃夫

什么。如果我将来有所成就，这也是他们的功劳，他们是极好的人，单是对孩子的一片爱，就值得赞扬不已，只这一点就可以忽略他们身上的一切缺点，而那些缺点，由于生活贫困，或难免……

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准确而透彻地评价了我们父母的性格和生活状况，评价了他们对我们所起的作用，他一生对他们都怀着深切的热爱。

我们这些孩子，虽然不得不干许多活儿，不得不遵守父亲的清规戒律，可是我们生活得和睦而快活。我们家里总是充满玩乐、取笑、顽皮和欢笑。在想出各种逗笑的即兴表演也好，搞天真无邪的儿童恶作剧也好，安托沙总是起主要作用，由他带头。例如，我一直记得，安托沙组织我们小孩演戏。有一次我参加演一个戏。当时我还完全是个小姑娘。我演的角色是塔季雅娜·切普鲁尼哈，我记得，根据剧情的发展，安托沙在“舞台”上当着大家的面拥抱我，我简直窘极了。

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对果戈理的著作，对他作品里的人物都非常入迷，并且经常扮演这些角色，把整场的戏演出来。两个哥哥，安东和伊万都打扮起来，穿上乌克兰民族服装。哥哥尼古拉演过果戈理的《圣诞节前夜》中的一个场面，他扮演醉汉丘勃，在暴风雪中寻找自己的茅舍，演得逗极了。

在我们家，《钦差大臣》享有很大的声望。我们小时候在家里经常演这个戏。安东·巴甫洛维奇通常演市长。他穿上他漂亮的中学生制服，纽扣闪闪发光，为了显得有气派，他在制服里垫些小枕头，该垫高的地方都垫高了。他的制服外面，没有佩剑，只挂一把平常的马刀，胸前戴着自己做的勋章。他化装很仔细，而且应该说非常精致。在所有“演员”当中，无可争论，他最有才能。如果用戏剧语言来说的话，他实际上既是导演，又是布景设计师。

哥哥伊万通常演赫列斯塔科夫，我演玛丽雅·安东诺芙娜——市长的女儿（在缺少合适的“女演员”的时候，我也演市长的妻子安娜·安德列

耶芙娜），哥哥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有时演仆人奥西普，有时演法官利亚普金-加普金。我现在想起这个戏的某些情节还忍不住要笑。例如，有一幕，赫列斯塔科夫（哥哥伊万扮演）向我走来，要拥抱我，我应该躲开他一点。可是我躲开他远远的，因为当着观众的面让人拥抱，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观众通常就是我们的父母、亲戚、熟人和邻居。最后，我一个劲儿往后躲，一直退到房间的墙上，所有的对白都念完了，赫列斯塔科夫原该吻我一下，可是始终也没吻着。

哥哥安东从少年时代起就具有异常敏锐的观察力。例如，他在城里、学校里或者熟人家里看到的事情，他能绘声绘色地描摹和表现出来。每当他模仿我们熟人身上可笑的特点，都要招得所有在场的人，从小孩到大人，笑得东倒西歪。安托沙甚至还开兄弟们的玩笑。他常给他们取外号，那些外号幽默极了，不过有时也挺气人。比方说，他管哥哥尼古拉叫“独眼龙”，因为尼古拉讲话时养成习惯，总眯起一只眼睛。他给尼古拉还取过一个外号，叫“站在大船上的细面条”，因为他两条腿又细又长，穿着非常瘦的裤子，脚上却穿着肥大的皮套鞋，样子确实滑稽。他那条裤子还是安托沙亲手做的，那时候他在一个技工学校学裁缝。我的几个哥哥在上中学的同时，都到那儿学习过。当初，安托沙给尼古拉做那条裤子的时候，尼古拉非要他把裤子做得尽量瘦不可（那时穿瘦腿裤时髦）。于是安托沙就极力照办了。

我也没逃脱可笑的外号。安托沙给我取了整整三个外号：“哈巴狗”、“小扁豆”和“光环”。最后一个外号惹得我特别生气，我为这个外号哭过。我小时候头发又短又直。为了让头发别乱，我用一个半圆形的梳子把头发卡住，可是头发仍旧不贴顺，梳子周围的头发竖起来，像光环似的。哥哥给我取的外号就是由这儿来的，可是我心里觉得十分委屈。

每逢节日，教堂举行祈祷时，我们的父亲一概要热心去参加，而且硬逼着全家人都得参加。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有时候这很不轻松：早早就得起床，还要在教堂里站很久。可是哥哥们即使在这种场合也还要开玩

遥远的过去——我的哥哥契诃夫

笑。比如，有这样一件事。

清晨。大家还睡得正香，根本不想起床。可是母亲催着大家起来，不然会耽误晨祷，父亲就要生气。父亲自己早在大家前面走了。最后，所有的人都准备好，只有安托沙一个人用被子蒙着头躺在床上，不理睬母亲的催促。

“安托沙，快起来……该去晨祷了。去晚了父亲会生气的，你还不知道他的脾气！……”

哥哥蹬蹬腿，不愿意听。

我们没有等他就到教堂去了。尼古拉也没有跟我们一块儿走。他早已经走了。他有一种天生的乐感，很喜欢在钟楼上打钟，当他把所有的钟都打响的时候，那钟声特别响亮悦耳，和谐动听。

我们往教堂去刚走了多一半路，出乎意外地瞧见安托沙在前面。原来，他还在被子里就穿好了衣服，我们走后，他很快起来，洗了脸，穿过几条小巷，绕到我们前面去了。

我们快要走到教堂了，可是突然……钟楼上所有的钟全敲响了。这么庄严的全部钟鸣，完全不是时候，大家都感到奇怪。原来，尼古拉在钟楼上看见母亲来了，就决定鸣钟迎接。全部钟鸣只有在教士临近教堂的时候才能用。不用说，哥哥由于干了这件事，遭到了父亲的处罚。

后来，我们家里的人常常回忆起尼古拉用钟声迎接母亲的事，每次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

我的兄弟们逐渐有了男孩子自己所特有的爱好，他们不让我加入他们的活动。虽然我还是跟他们一块玩棒球，玩羊拐子，可是毕竟跟兄弟们一起玩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加上对母亲的依恋，也使我这一时期不能和他们接近。夏天，兄弟们经常结伴到海上去捕鱼，到草原上克尼亚扎亚村我们的爷爷那里去，而我留在母亲身边。

那时候，大哥亚历山大在中学高年级读书，不大与我们来往。他觉得，他已经不适于跟我们这些小孩子一块儿生活和游戏。后来，他上中学

最后一年，就干脆从我们家搬出去，到中学校长埃·鲁·赖特林格尔家去住，为他的孩子们补习功课，得些报酬。

★ ★ ★

1875年8月，我们家里的人口减少了：大哥和二哥到莫斯科去上学。大哥亚历山大中学毕业后，考进莫斯科大学，二哥尼古拉在绘画方面显露出很大才能，也跟大哥一块儿走了，希望考进绘画雕塑建筑学校。

这个时期，我们父亲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他在给莫斯科的两个儿子的信中，开始流露出忐忑不安的情绪。例如，他在1875年8月18日的信里写道：“我的买卖一天不如一天。我已经有点灰心丧气，妈妈看到我这样，也不知如何是好。唉，钱，钱！要不去托人情，清清白白地弄到钱可真难……”

我们的父亲从来没有显出做生意的才干，虽然他有一个“三等商人”的称号，可是他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地地道道的商人。最后他的生意陷于困境，欠下大堆债务，特别是他又筹划盖了自己的房子，导致他的铺子不得不停业。1876年4月，父亲彻底破产。4月23日，他为了躲债，几乎是从塔甘罗格逃到莫斯科去的。这一事件使我们的生活完全变了样，生活状况急转直下。

父亲在莫斯科住在亚历山大和尼古拉那里。他们俩过着清苦的大学生生活，父亲来到，他们也帮不了他什么忙。在塔甘罗格盖好的房子被夺走抵了债。

1876年7月，我们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米哈伊尔也到莫斯科来投奔父亲。安托沙和哥哥伊万留在塔甘罗格，继续在中学读书。可是伊万不久也搬到我们这里，只有安托沙一个人留在塔甘罗格。

在故乡那种无忧无虑的幼年时代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莫斯科的艰难贫困时期开始了。

二 贫困的岁月

1876年莫斯科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我那时已经13岁。莫斯科真让我惊叹不已，因为我一直住在安静的外省小城塔甘罗格，那儿的生活古老守旧，街道不铺路面，泥泞不堪。莫斯科的楼房宏伟高大，剧院富丽堂皇，那无穷无尽的大街小巷，害得我后来不止一次迷路，商店、小铺、粮店不计其数，广场上的货摊热热闹闹，像赶集一样，空中响着著名的莫斯科钟声，铁轨马车隆隆作响，这一切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

如今，莫斯科的面貌已经大变，要是把一个当代青年带到七八十年前我初次看见的莫斯科，那么这个城市大概会让他觉得非常陌生，甚至有些滑稽可笑，而且既冷清又土气，就跟我们当时见到莫斯科而回想塔甘罗格的情景一样。可是那时候，莫斯科在我们眼里是个繁华的大城，处处都使人震惊，这就是我们上小学起就熟悉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俄国古都莫斯科。

我们在莫斯科格拉切夫卡街住下，这条街在苏哈列夫花园街与喇叭广场之间。我们租下一所小楼的地下室里的一个房间。哥哥尼古拉起初也搬

到我们这里来住。我们在塔甘罗格宽敞的房子里住惯了，现在全家挤在一个房间里，觉得很难受。

前面等待着我们的还有更大的考验。充满贫困、艰苦和烦心事的岁月开始了。父亲怎么也找不到工作。家里没有钱，母亲每天犯愁，拿什么给家里人吃。屋子里很不舒服，潮湿，寒冷。冬天，没有钱买木柴。我现在还记得，我哥哥尼古拉跟他在绘画雕塑建筑学校的朋友和同学，后来成为建筑学院士的弗兰茨·奥西波维奇·舍赫捷尔，用大车运过木柴，送到我们家里，供生火和取暖用。

后来我们搬过许多次家，都住在莫斯科的一些小巷子里。我们通常三个人一起去找房子：母亲、米哈伊尔和我。母亲怕狗，她和弟弟留在大门外，我总是大胆地走进人家的院子，打听租房的事，要是合适的房子，我才把母亲带进去。

对我来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过去了。摆在我面前的已经是另外一种严肃的生活。现在我得实实在在地帮家里的忙了。

艰苦的生活逐渐锻炼了我：我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姑娘变成独当一面的管家人。饱经忧患的母亲时常害病，我得完全代替她干家务。我做饭，给全家人洗衣服，缝缝补补。我一有空闲的时间，就用毛线织头巾，每块头巾卖15至20戈比，为增加全家的收入贡献自己的力量。大哥亚历山大在大学读书时期，用他工作挣来的微薄收入接济过家里，可是这种事很少有，钱数也少。安托沙依照母亲的要求，把留在塔甘罗格的家具什物卖掉，将所有的钱寄到莫斯科我们这里来。

弟弟米哈伊尔也帮我在家里干活儿。每天早晨天还不亮，他就要早早起来，到小铺去买面包和吃食。我们年龄最小，而命运却逼迫我们承担忙碌的家务，这使得我们俩十分亲近。小小的米哈伊尔，遇上阴雨绵绵，或者天寒地冻的天气，却穿得很单薄，跑遍莫斯科，办些琐碎的事情，我看着总是很心疼。